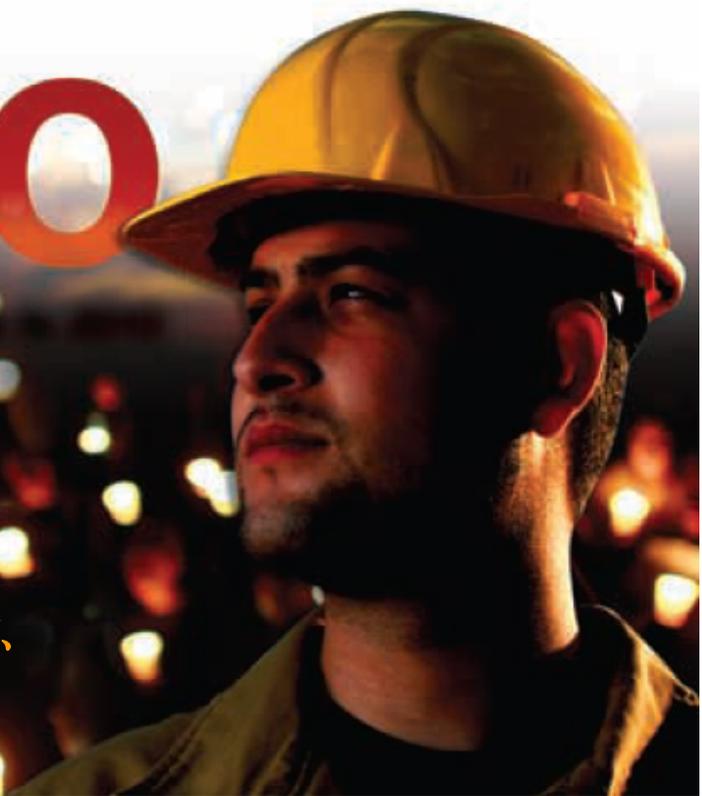


4,690

2010年工伤死亡人数

“可接受的损失”对EHS（环境、健康和安全）有何意义？



编辑：DAVE JOHNSON

可接受的损失被视为是业务经营活动中一种可接受的成本代价。

美国公众完全没有表现出争取进一步改善工人健康和现状的意愿，目前社会中存在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美国工作场所发生的风险和人员损失已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工会门前没有愤怒、没有抗议，没有行动，而且更糟的是，没有与环保主义相等同的关于工人安全愿景的表述。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地球日宣言中简明扼要地针对环境状况作出了呼吁：“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漠不关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建造巴拿马运河期间（1904年至1914年），大约5,600名美国工人死于疾病和意外事故，

（在美国接管运河工程之前，大约22,000名法国工人死于疾病和意外事故）但却没有任何舆论抗议或国会调查的记录。真是眼不见心不烦。

1912年，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计，美国有18,000至21,000名工人死于工伤。1913年，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死亡人数为23,000人。除揭发黑幕的记者外，依然没有抗议和调查行动。成千上万入境移民对工作的需求使得安全问题成为虚设。1900年至1910年之间，有九百万移民来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工人基层的人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市郊舒适生活。



在建造巴拿马运河期间，美国工人的死亡人数约为5,600人。

而这一次，安全问题依然败给了金钱的诱惑。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粗野的年代，新出台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SHA）中不仅涵盖了各方面的标准而且每年还要开展70,000至80,000次巡查活动。整个商界被激怒了，开始发起“终止OSHA”的抗议活动，工会也对捍卫和提倡这种标准的做法予以还击，而公众呢？他们依然置身事外，保持沉默。

从那以后，《职业安全与健康法案》（OSHA）便戏剧般地败下阵来（即在上世纪70年代，平均每八年推出一项标准，巡查活动也减了一半，并且根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监察官员表示，各地和解协议的丰厚罚金从40%至90%不等。死亡率和工伤率的下降（20年前，6,217名工人死于工伤）也降低了人们对紧急状况的敏感性。主流媒体对美国蓝领阶层不感兴趣，从而中断了和该阶层的关系（极少的潜在订阅者）华盛顿立法委员没有通过任何有意义的工作安全和健康方面的法案。

白宫和劳工部也没有制定任何改善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的目标。只有像深水地平线爆炸和煤矿坍塌这种毁灭性灾难的报道能暂时吸引公众的眼球。



试想一下，如果奥巴马总统在今年四月的工人纪念日宣言中表明至2025年将因公死亡事件和工伤人数降至一半，那么就相当于肯尼迪总统承诺的至上世纪60年代末就能实现人类登月的目标一样。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支持者知道制定目标的刺激性效果，但总统却很少谈及工人安全的问题，更不用说通过宣讲目标表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和经营成本）了。

和环保主义不同的是，没有上百万学生、教师、积极分子和官员为世世代代的工人争取健康的未来。除农耕作业外，办公室、工厂、仓库、铁轨、航道以及州际公路、施工现场和农场及牧场这些工作场所对那些易受伤害的儿童没有威胁。公众与这些工作场所风险的距离是容忍死亡人数的主要原因，除遇难家属外，这些死去的人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环保署（EPA）获得的预算是OSHA的五倍，因为环保主义能赢得民心和政府支持，是一种草根行动，而且其媒体关注度只能令OSHA望尘莫及。空气污染、水污染、铅中毒、超级基金场地和危险品泄漏都不是远距离威胁，而是就在自己的庭院和社区内。这对公众而言简直是近在咫尺。

但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屈服于这种可接受的工伤和疾病损失。不是还有像Bill Borwegen、Mike Wright、Jim Fredericks、Eric Frumin 和 Peg Seminario这样的工会安全和健康领袖么。不是还有像 Ralph Nader（现任）、Garrett Brown、Ron Hayes、Billy Robbins、Celeste Monforton、Liz Borkowski、Nancy Lessin、Michael Silverstein、Mary DeVany、Andrew Cutz 和 Joel Shufro 这样的积极分子么。不是还有像 Charles Adkins 和 Mike Connors 这样的OSHA官员，以及像John Howard博士、Jordan Barab博士、Deb Berkowitz 博士和 David Michaels博士这样的机构政治任命官员么。

他们热情激昂，但可行使的职权却很小（预算少、没有大批的追随者、可接触的媒体和国会议员有限）。而且，职业安全与健康学会也没有保持沉默。从今年起，美国安全工程师学会（ASSE）和学会主席 Terrie Norris 发布声明：“工人死亡的统计数字保持稳定并不是什么成就，而且还有证据表明，美国在保护工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已停滞不前。但这些统计数字恰恰是美国保护工人的一个新典范。”

但是，有谁会为这个新典范掏腰包呢？工作场所安全的制度提倡者显然身陷缺乏资金支持的困难境地。与环保署获得的83亿美元的预算相比，OSHA（5.64亿美元）、化学安全委员会（1,300万美元）、矿山安全和健康管理局（3.84亿美元）、国家职业安全与卫生研究所（1.28亿美元）的预算真是小巫见大巫。

公众的麻木感不会影响数千家企业的企业文化。OSHA志愿保护计划标志的扩张。而像对杜邦可持续解决方案、BST/DEKRA、ORC/Mercer、Aon、DNV 和 BSI 美国这样的高端咨询服务业务每年却有五位、六位或七位数字的资金投入。一批小型的，通常只需一位EHS顾问的中间市场的业务，有些也能大赚一笔。

而那些由上百万家小型商店和承包商组成的低端行业则无人问津，但这些行业通常有很多工伤和死亡事件发生。

但是，自2008年至2012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以来，用于EHS措施的企业资金和人力资源就显得捉襟见肘，而且这种紧缺还超过了跨国公司和全球EHS管理系统的界限范围。ASSE学会主席Norris 表示：“我们需要提醒企业，他们不应该削减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系统上的投入，”“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在未来他们则会面临一系列问题的严重困扰，如卫生保健和工人成本的增加、生产延误、声誉受损等等，甚至更多。”

此外，根据ISHN的2012白皮书的读者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EHS支持者在今年将面临裁剪预算的问题；12%的企业将削减人员；44%的企业将延长工时，还有46%的企业表示，他们将承担更多工作和更大压力。

安全经理Dan O'Brien表示：“我认为EHS的运作会继续面临资金越来越少的局面，”

EHS的资源争夺是美国当局对工伤和死亡事件漠不关心的另一后果。公众对企业施压以改善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成果几乎为零。但是，由于像苹果和耐克这样的行业巨头在他们的全球供应链过程中再加上对工作安全和健康问题失去控制，媒体对苹果公司的台湾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工人自杀事件的指责性报道，使得公众施压的力量变得很明朗。不过，美国公众似乎更关心对流行品牌的保护而非本国劳动力。

恕不赞同

并非所有的EHS专家都认同公众对工伤死亡事件采取被动接受态度。著名的风险沟通专家，Peter Sandman 博士表示：“或许，在我们接受预先安全改进和关注其他那些同样没有改善或走下坡路的人的生命之前，当前的停滞状态只是暂时的”。

致尊敬的工伤殉难者

Rockford Greene公司的安全顾问Phil LaDuke以安全支持者的论调写了一篇博客，文章表示任何工伤死亡事件都是一次不可接受的损失。请访问www.ishn.com 网页并点击主页上方的“资源”选项中的“随机抽样”选项。

国际安全设备协会会长Daniel Shipp表示：“坦率的说，我不相信我们在可接受安全的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全民共识，”这是为什么呢？Shipp说：“因为大家并没有给予这个问题足够的关注，”EHS顾问James Leemann博士表示：“即使在OSHA没有出台时，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健康问题也从来不在美国的国家忧患意识里”。

宝洁公司全球安全与健康前任董事Richard Fulwiler博士表示：“在那些追求损失均担的企业里确实存在接受损失的现象”“但是，对于那些力争成为世界一流或卓越的企业来说，我并不认同接受损失的说法。”

感受悲痛

2010年，4,690死于工伤的工人家属无法认同这种可接受的说法。在经过最初的打击之后，很多人感到沮丧和绝望，因为他们无法从像OSHA这样的政策法案中得到答案，而且如果雇主试图逃脱罪责，他们几乎没有渠道能够发泄他们的悲痛和愤慨。

“我无法入眠，我随时都在打肾上腺素。我得时刻依靠药物”Tammy Duncan说，他20岁的儿子Kerry Edward于2010年在西弗吉尼亚州打工时死于电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的那一天我觉得自己几乎失去了一切。他们的说法是他在吸毒，可如果我们作为家属不能还他清白的话，我们会被彻底击垮的”。

由于大多数美国人和纽约及华盛顿的媒体都甚少会拿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州乡村里类似Tammy Duncan这样的事当由头，因此对于公众认为需要有必要部分改善工作场所安全和健康的部分，美国政府也全部买账。

在美国现代化社会中，最有可能面临工伤死亡威胁的工人包括渔业工人、伐木工人、飞机维修人员、农民和农场主、矿工、屋顶工和垃圾收集工。

个人与风险事项的距离这正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拖再拖的原因。死亡人数并没有灼痛大多数美国人的民心。总体死亡数字还是很低的。

根据 icasualties.org（伊拉克联军伤亡数）的统计，从2003至2012年，4,486名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阵亡，这个数字还略低于一年内的工伤死亡人数。而在2001年至2012年的阿富汗战争中，有1,958名美国士兵阵亡。但没有几个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伤亡人数提出质疑。而最近的一次风险要数2001年的恐怖袭击，尽管危险如此接近，可现在看来就像是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其影响力似乎正在日渐萎缩。



根据收集的资料表示，个人风险接近性最高的是越南战争。

相比之下，越战触动（和打击）的家庭更多。在1967年至1969年间，死亡总人数为58,269人，占总人数的68%。大量浸满鲜血的运尸袋无法令民众无视他们的存在。那时，电视媒体每晚都会报道。这种征兵行动让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处于危险之中。公众对危险的接近感以及恐惧和愤怒，导致群众集会、静坐示威、抗议游行、几近发生内战，也由此诞生了一位跛脚鸭总统（约翰逊）。

但是，大规模损失并没有转化为国家悲愤和起义行动。2012年2月发生的机动车撞击死亡总人数为5,280人— 高于一年内的工伤死亡人数。

平均来看，美国每年因车祸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45,520人。这一数字与十多年前的越南战争的死亡人数接近。但是，却没有出现保障公路安全方面的静坐示威、抗议集会和抗议游行。公众对每年45,000起公路死亡事件采取了接受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呢？风险近在咫尺，而且每个人都是要开车的。

即使很少有人知道死于车祸的人是谁，但大多数人在所认识的人中都有过遭遇车祸的经历（3,158,000起车祸事件中）。

公众对于风险的态度部分是由个人控制感而形成的。

因为在车内，人们感觉车辆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除非遇到一个醉驾司机，这才是驾驶所不能容忍和要求严厉处罚的原因。而在飞机上，人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对每年45,000起飞机坠毁事件无法容忍的原因。公众对工作场所的控制感是——你可以接受危险性工作也可以不接受——但却忽视的环境因素（没有人能避开空气污染）。

EHS的招聘人员Dan Brockman表示：“普通市民对于由意外事故导致的死亡话题漠不关心”

“事故发生了。一天中有12个人死于工伤，那又怎么样呢？人们照样收看关于阿拉斯加捕鱼船的电视节目，还觉得每天没有什么工伤死亡事件发生。每年有四万人死在高速公路上，却没有人愿意关注。”

每年都有超过三百万工伤事件发生——这一惊人可悲的数字应该引起公众的重视。但大多数工伤并不严重，也没有危及生命。在脑海里粗略计算一下，每年有大约11,000名工人会遭遇截肢。工作场所的安全和健康应该成为那些遭受严重伤害的工人和家属振臂高呼的口号。

但是，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切除手指在内的所有非致命性截肢的比例占94%；指尖截肢手术占74%。谁没见过少了一根手指或半根手指的年长木匠呢；这没有不足为奇。这不仅不会引起众怒；反而会成为授予工人的荣誉徽章。

对工作场所的担忧？

国民默认：我们对工作场所的风险已经达到了可接受和可容忍的程度。是的，依然有太多人照样受伤、死亡，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在七百万个工作环境中，你永远无法实现零事故——而且在国家大事面前，你不得不出优先项的艰难抉择。媒体和政界对公众的疑虑有所反应，但盖洛普调查显示，公众对工人安全和健康的问题并不关心。

在2012年3月28日开展的题为“美国民众的国家忧患”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对公众关心的事件做了一项排名：

- 经济
- 油价
- 美联储支出/预算赤字
- 可获得和可负担的卫生保健
- 失业
- 社会保障
- 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
- 饥饿和无家可归者
- 犯罪
- 吸毒
- 环境质量——关注度占37%
- 恐怖主义
- 非法移民

工人安全和健康不再排名前15名以内。或许不再前30名以内。其中进一步的原因是：

一，70%的工人对其雇主对健康和安全隐患的做法感到满意。不满意的比例仅占9%。（2011年3月美国心理学协会和哈里斯互动民意调查）

二，工伤和疾病事件创下历史最低记录。工伤死亡事件从每日16起降至每日12起。三十年来，工伤死亡事件出现了下降趋势。

死亡人数的下降速度和1933年至2005年的下降速度一样快（记者John Stossel在他的新书中指出）。自OSHA法案颁布以来，工作场所的死亡事件下降了65%。工伤事件下降了67%。

三，OSHA法案每八年出台一项政策。Fulwiler博士表示：“违反OSHA法案规定只是一个阶段事情，”

四，企业对虚饰的可持续报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功故事较以往有了更多的关注。

五，工人安全和健康问题还没有被广泛视为一项可持续课题。Fulwiler说：“这应该作为一项课题，而且我在研讨会讨论中已经加入了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似乎能够产生共鸣，只是我们对‘可持续派’主张的反应太晚了。”

六，垂挂在低处的危险果实已经被采摘下来。进一步提高安全性的代价是很昂贵的。福特汽车公司行业卫生部门的前任主管Henry Lick表示：“大部分棘手的事情都被克服了，”

七，据亨特学院的Frank Mirer 博士介绍，与非作业环境中普通员工相比，受物理和化学品深层危害或长期危害的员工比例仅占30%。

付出代价

对EHS而言，公众对工伤和死亡事件的接受态度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实行维护模式。

Peter Sandman表示：“如果社会对进一步提高工人安全缺乏热情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对维持安全现状要求关注度、舆论压力和安全专业人员的情况也是真实的，”“当安全维护的目标比安全问题的永久性改善的目标更为适宜时，或许对很多企业组织而言时机已到，但显然还不是全部。”

对安全专业人员的需求正在萎缩。

招聘人员Dan Brockman表示：“在1986年，公司还愿意支付30%的招聘费雇佣一名合格人员来实行这一计划，”“但到2012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现在，公司只愿意支付20%的雇佣费，而低于75,000美元的数字也属于OSHA法案的规定范围，因此这些客户公司不必承担罚款。”

Leemann说：“美国正在向以服务为导向的商业模式的方向发展。”

“结果是，我们就再也制造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了。对安全和健康专业人员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会急剧下降”。

加工厂和数千个小承包商对移民工的持续使用和工作环境的保密性是最危险的。

根据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尽管拉丁裔工人的致命工伤率从2009年的每10万人中的4个下降至2010年的每10万人中的3.7个，但是，拉丁裔工人的工伤死亡率与全部美国工人的死亡人数相比要高6%。2010年，在外籍工人的工人人群中，拉丁裔工人占到55%。

尽管对可持续发展和企业责任承诺和成果的宣传投入越来越多，但是除工伤疾病率和成功故事以外，那些不愿向公众透露工作安全问题的**公司仍然缺乏透明度。**

白宫缺乏远见。

Phil LaDuke顾问表示：“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都没有制定任何关于安全方面的目标，”“我们一直在鼓吹‘零工伤’的真理，可即使是其他学科的聪明人也能告诉我们这种目标是不可实现。”我们总是在追随狂热中的怪念头、信奉谎言背后的谎言、在拙劣的方法中套用拙劣的方法。遗憾的是，我们甚至无法认同“安全”这个词的标准含义。

“可接受风险要由公众、雇主和政府做出最终裁决，可我们在建立精确构筑可接受风险的愿景上又太过迟疑。”

EHS的支持者要怎么做才能防止被边缘化呢？

LaDuke说：“醒醒吧，”“EHS需要找到支持和配合运作策略的途径并最终做出实际贡献。

对安全专业人员来说，在不断完善和提高生产率上所做的努力远比告诉工人要当心作业步骤和谨慎因为他们的孩子爱他们这种话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Tom Lawrence顾问对此表示认同：“OSHA 法案正在朝远离基本危险防护的方向发展并朝着卓越运营的增值领域迈进。

CIH公司的Andrew Cutz表示：“清洁和环保才是正道，”不过我们需要找到财务激励政策才能做到。降低医疗保险费怎么样？”

风险沟通顾问Peter Sandman博士表示：“或许，安全专业人员需要思考如何才能引起关注，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公愤’，‘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公愤’”。

Leemann说：“如果安全和健康问题的支持者现在希望能提高他们在工作场所的相关性，那么，他们需要注重怎样做才能实现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的问题，”“让公关人员应对可持续发展。”

Leemann补充道：“给聪明人的建议是，拥有一本最新的护照和出国的意愿，因为在未来那里才有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行业卫生专家Aaron Chen表示：“我们需要看镜子里的自己，跳出传统的界限，开始像其他行业的人一样推销自己，”“如果你问一问其他人，医生、护士、律师、警察、消防员、化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教师、教授等等，这些人都在做什么，大多数人至少都能轻松地给你一个笼统的答案。

但是，如果你在超市里遇到一个做民意调查的人，问问他们是否知道一个合格的安全专业人员或行业卫生人员都在做什么。你会看到一张呆滞和毫无反应的脸。”

安全经理Jack Daugherty说：“不要只对着你的啤酒哭泣，”我所做的大幅改善很少能获得认同。我只能对我做好的工作感到满意。这才是重要的；我们做工作不是要让他人注意到。”

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希望。

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961年的1,600万上升至1979年的2,100万，又从2003年的1,600万下降至2010年11月的1164.8万人。制造业总体就业人数的百分比下降了10%左右。现在怎么样了呢？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表示，此前移居海外的美国制造业人士开始回流，尤其是移居到中国的人。据专家分析，至2015年，中国的成本优势将会面临缩水，到那时，很多制造商会有意在美国建厂。

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认为，在未来五年，成本风险平衡将达到引爆点以支持美国七大重点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制造商已转向中国市场：其中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家电和电气设备、家具行业、金属制品业、塑料和橡胶业、以及货物运输业。

Aaron Chen表示：“随着美国的行业发展开始出现积极转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黄金时机，这是帮助企业组织以较少成本实现更快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大声说出来。劳工部秘书长Hilda Solis说：“勇于表达你的意见。无论坐镇白宫的人是谁，除非你敢于讲话，敢给我们的州级和国家级的政治人物上上一课，不然我们的对手就要赢了。而且那些原本可以挽救生命的无辜者们则会被人们所遗忘。”

OSHA法案的领导者David Michaels在他的工人纪念日演讲中讲到：“要求每一位候选人为工作安全做出承诺。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支持工人保护公开发言，为国民损伤和疾病预防计划而共同努力。”

接受变革型领导。

Fulwiler 说：“当企业接受变革型领导的概念时会获得巨大收益，”“变革型领导不仅能推动安全领域的职能卓越性，还包括成本、产品、质量和业务连续性方面的职能。

这并非雾里看花。我有很多很好的例子。”

安全经理Mike Kalbaugh表示：“推动合规安全计划对安全专业人员来说是或应该是一种持久性举措，”“我们需要将人员、利润和地球这三个要点的安全改善联系起来。我们应该将生产流程落实到位，以显示伤害预防对高品质产品的高效生产的影响，而高品质产品则能促进收入和客户对按时交付满意度的提高。

Dan Shipp说：“一切都归结到办公室一角，”“高层管理人员需要建立危险曝光和不可宽恕的危险作业和危险工人行为的相关制度。一位EHS专业人员要能通过统计数字向老板的老板销售这种概念，以及多种管理变革模式以说明可预防损伤对利润的影响。

可结果是，这种可以长期降低工伤和疾病事件的做法从老板（或业主或股东）那里得到的承诺却是零，而且老板深信EHS支持者不会对公司有所作为。